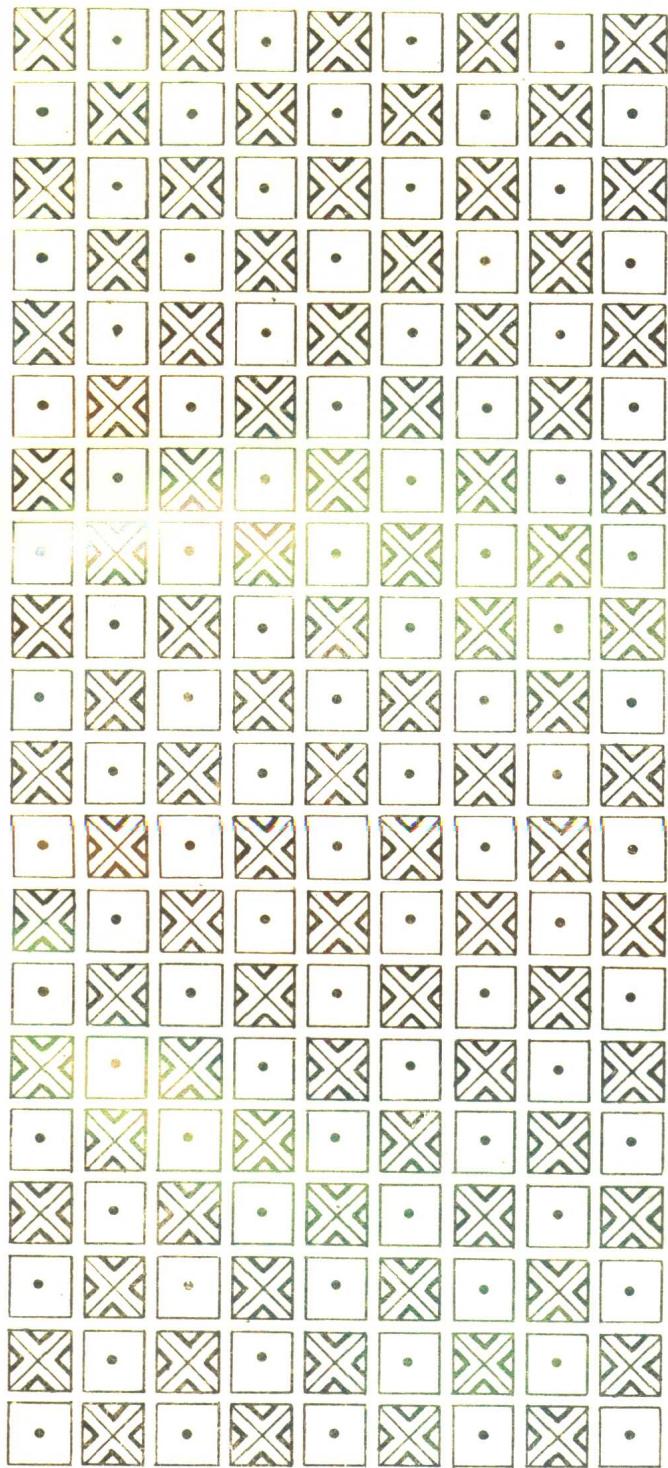


杭
第
教
育
文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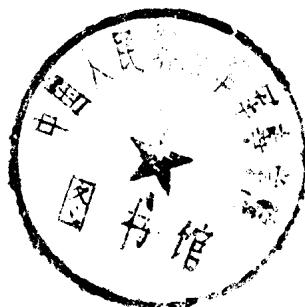


G740
7

2 033 2156 5

杭州教育文集

本社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杭 莘 教 育 文 集

本 社 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在 杭 莘 在 上 海 发 行 所 发 行 上 海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开 本 850×1156 1/32 印 张 14 插 页 3 字 数 320,000

1985 年 9 月 第 1 版 1985 年 9 月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1—5,300 本

统 一 书 号：7150·3425 定 价：(软 精) 2.45 元



杭 莅 近 影

自序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从参加接管上海市教育工作起，到现在离开教育行政工作岗位，屈指三十五个年头了。其中有五年时间临时参加修订《辞海》工作，但并未离开教育工作岗位。

现在，我把三十五年来在报刊、书籍上发表过的有关教育问题的文章，以及粉碎“四人帮”后一部分尚未发表过的讲话记录，整理汇集起来，编成这本集子。

在这本集子中，解放初期的，我选了在《新教育》发表过的三篇。为了使读者能了解解放后到1956年止上海教育工作整顿、改造旧学校的大体过程，我把最近为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室写的《接管上海中小学的一些回忆》，也收录在这本集子里。1953年起，我们的国家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政务院初步提出了学校教育要培养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要加强劳动教育。《文汇报》及时发起了一场“为什么在学校是一个好学生，在工厂不是一个好的劳动者”的大讨论，达数月之久，以宣传贯彻政务院的指示。我为《文汇报》写了一个讨论总结，这次也收进了集子。

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1958年又掀起了“教育大革命”。我把反映当时教育思潮的两篇文章作了删节，收集

在这本集子里。

1959年至1964年，我主要参加修订《辞海》工作，没有写有关教育方面的文章。196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要编辑出版《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录》，我写了两篇文章。其中《在老解放区编写教材的一些情况和体会》这篇回忆录所谈到的体会，以及修订《辞海》工作的体会，同我后来在教育工作中的有些指导思想有密切联系，所以也都收录在这本集子里。

这本集子中的相当多的文章，是我在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写的。在这期间，我主持上海教育行政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海教育工作拨乱反正的过程和进展情况。

我在这里讲了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的大体情况以后，借此机会想说一说我主观上的一些想法。我在参加革命以后，受到了党和毛泽东思想的哺育，思想觉悟和认识是在逐步提高的。但由于只是在少数时间以及结合工作利用业余时间片断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缺乏比较系统的学习，所以进步、提高受到很大限制。1955年至1956年，党给了我一个机会，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了一年，系统地学习了四门课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我把学习重点放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上，并以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普遍性的原理，去学习了《资本论》。

学习一年回到工作岗位以后，我努力想把实践论的观点和矛盾的对立统一的观点，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去，一边实践，一边继续学习。我曾把学习以前和学习以后作了回忆比较。例如，我发现以往对从实际出发的理解是片面的，因而是错误的。这便是我片面强调“实际”——现状，而忽视“出发”，缺少发展的观点。因而在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时，强调所谓“稳”，实际是一种

保守思想，墨守陈规的思想，表现在工作中是“稳”而不前，不懂得以对立统一的观点，来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因而工作上缺少生气，工作进展缓慢。在系统学习了以后，自己感到在思想上解放得多了，工作中也比较有生气了。我在参加修订《辞海》的工作中，也总是想怎样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指导来从事修订工作。这是给我的一次很好的锻炼。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就是在上述指导思想指导下从事教育工作的。这几年来，为了恢复整顿学校教育，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我年年讲领导工作的三点意见。这三点是：(1) 从实际出发。我把这句话理解为：“实际”，就是现状、客观存在，了解实际，就是了解客观存在的矛盾；“出发”，就是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完整地理解，就是从现状想到奋斗目标，揭露矛盾，经过对矛盾的分析，寻求解决矛盾的措施，去逐步实现奋斗目标。要了解实际，就要调查研究，在调查实际的基础上，分析研究，有的放矢地解决矛盾，尽可能在工作中力求做到主观符合客观，使工作不断发展，不断前进。(2) 抓点，以点带面。有了问题，有了分析，有了措施，便发出一般号召。在一般号召以后，又必须紧接着蹲点，解剖麻雀，以期在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用榜样引路，来进一步推动一般。我认为能这样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工作容易取得成绩，提高工作质量。(3)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通过一般号召，讲明道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继之以从实际出发、以点带面，进一步不断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只有不断地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才能团结一心，步调一致，使工作不断发展、不断前进。我坚信，只要在领导工作中认真做到以上三点，就有可能使工作不断取得成绩。

我还以《实践论》、《矛盾论》为指导，在学校教育工作中提出另外的三个三点。就是：第一，在贯彻教育方针的指导思想上，

提出三个“全”：（1）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2）面向全体学生；（3）课内、课外全面安排。第二，在普教的办学思想上，针对实际情况，提出“办好小学，加强初中，提高高中”三句话。第三，教学指导原则也用三句话：“加强基础，培养能力，发展智力”。

以上四个三点，尤以领导工作的三点为核心，这是做好其他三个三点和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此外，我又提出“双比”精神，来保证工作一年更比一年好。所谓“双比”，就是：第一，比“在原有基础上的进步”，比谁的进步快、进步大，使工作健康地发展；第二，比“经验”，比谁的经验多，谁的经验好，以逐步探索工作规律。我认为：比进步，“自己同自己比”，“比原有基础上的进步”，是促进不断“进步”的积极力量，是一种“规律”；比经验，又是探索工作中的“规律”，使工作既健康、又能加快“进步”的一个重要途径。故只要能坚持贯彻这“双比”精神，既有利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又有利于保证工作不断取得较快的进步，取得较好的成绩，“一年更比一年好”！为了使工作较好地贯彻落实，抓工作要“准”和“狠”。准，即工作要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力求符合实际；狠，即要抓得实一点，有力一点，抓出成绩来。

总之，最近几年，我反复提出这四个三点以及双比精神，和“准”、“狠”二字，想以此抓好工作。这是我的主观愿望，虽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自己深入不够，还是一般号召多，以点推动面抓得不够有力，所以成绩还不大，不够理想，深以为憾。

我之所以要把这本集子公开发表，一方面是回顾我三十五年来的工作，以接受教育战线的同志们的检验和批评指教；另一方面想借此来激励自己，在我有生之年，继续做些调查研究工作，以补我过去工作的不足。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接管上海中小学的一些回忆	1
谈建立民主秩序.....	14
中等学校成绩考查的基本精神.....	24
贯彻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性.....	29
为培养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而奋斗.....	35
——从韩××事例中吸取教训	
《上海教育》创刊了.....	56
走群众路线，勤俭办学，提高教育质量.....	59
迎接上海市优秀教师代表大会.....	64
——重视总结和推广优秀教师的经验	
做好中小学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67
总结经验 交流经验.....	71
——跳出“必然”王国，走进“自由”王国	
对立统一规律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76
普通教育的任务.....	86
对几对矛盾关系的认识.....	88
在老解放区编写教材的一些情况和体会.....	97
正确处理矛盾，多快好省培养人才	109
改进课堂教学，迅速提高教育质量	115
把幼教工作同社会主义建设紧紧地联系起来	121
比经验，比进步，极大地调动广大师生的积极性	124

当前中小学工作的主要任务	127
幼儿的“教”和“养”	136
——关于幼儿教育的几点意见	
关于教育工作中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	139
试论“以教学为中心”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151
人民教师生活的辩证法	158
切切实实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160
关于领导方法问题	170
让青少年在集体活动中受到教育	176
——暑假寄语	
谈语文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178
语文教学方法要改进	192
我们是怎样抓重点学校工作的	199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努力提高中学政治课教学质量	208
既要减轻学生负担,又要提高教学质量	218
学习好,身体好,思想品德好!	224
育人三十载 桃李满天下	226
关于政治课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几点意见	228
从实际出发,发展郊县业余教育	237
一定要办好小学	242
在新的学年中,争取更大更快的进步!	253
纪念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255
坚持从实际出发,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	262
谈“加强基础,培养能力,发展智力”	265
祝贺《小学科技》创刊	278
《上海市中小学教育工作经验选编》前言	280
“一年更比一年好,定叫今年胜去年”	285

端正农村教育办学指导思想	298
——农村教育要为农村建设服务	
再接再厉 乘胜前进	303
——为《小学语文教学论文选》序	
要取得最佳教育效果	308
——谈编写“小学思想品德课”教材	
孩子的成长与家庭教育	310
文道统一,加强基础,培养能力,发展智力	313
坚持四个“三点”,狠抓四个“落实”	324
振奋精神,努力开创教育的新局面	335
关于语文教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	346
探讨“文道统一”问题的现实意义	360
从实际出发,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	362
赞“走自己的路”	367
提高教育质量要有全面观点	374
从实际出发,讲一点辩证法	376
——中小学一定要推行“四用语”,加速推广普通话的步伐	
关于教育要“三个面向”的若干认识问题	379
编写小学六年制语文教材的若干意见	385
杨浦区、黄浦区视导工作小结	393
政治思想教育的几个“结合”	404
发挥创造精神 培育创造性人才	406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精粹之一	
“三个面向”与培育创造性人才	415
附录: 提高质量和解决矛盾	427
——编写《辞海·未定稿》的体会	

接管上海中小学的一些回忆*

一九四九年三月，我们自山东济南随军南下，先到滕县，学习接管城市政策。后经江苏徐州至扬州暂住。这时我和几位同志接受了编写《工人课本》（进城后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的读物）的任务，写了初稿。约十天左右，渡长江至丹阳，等待上海解放，并具体制订接管计划。我们的建制是“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市政教育处”，戴白韬、舒文同志任正副处长，任务是负责接管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所属的学校和单位，主要是中小学，也包括市属四所大专学校（师专、工专、体专和水专）和全部社会教育机关，包括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俱乐部、体育场所和补习学校。我是市政教育处中等教育室主任，具体负责接管中学（包括大专）；洪林同志是初等教育室主任，具体负责接管小学；胡就明同志是社会教育室副主任，具体负责接管社教单位。

我们的接管工作，有比较充分的准备。一是认真学习了党中央和军委制定的接管政策，二是得到上海地下党教育委员会的配合。地下教委动员了所属党组织以及团结在党周围的群众

* 本文发表于1984年5月出版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辑的《上海解放三十五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

组织和积极分子，发动了护校工作，以迎接上海解放。地下教委还初步拟订了配合接管工作的计划，把一些主要学校的情况、材料送到丹阳。我们在一有政策、二有情况的前提下，在丹阳初步制订了接管工作的具体计划。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我们乘火车自丹阳至上海郊区南翔镇。二十五日傍晚我们被送到交通大学。地下教委马飞海、方明、陈育辛、龚兆源和毕玲等同志随即和我们会师了。他们准备好一个配合接管的组织，并进一步具体介绍了一些学校和单位的情况，还准备了一个参加接管学校包括可以担任正副校长和教导主任的名单。我们进一步修改并最后确定了接管计划。

一 接管公立学校

五月二十八日，正式接管国民党市教育局。几天后，宣布留用名单，其余一律参加集训。六月五日，召开市立专科学校、中等学校教职员座谈会，由戴白韬同志宣布接管政策，学校一律照常上课，单位照常办公，所有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又宣布学校废除训导制度，改为教导合一制；取消公民课，改设政治课以及宗教与学校分开等具体政策。由于党在人民群众中威信很高，接管政策一宣布，人心就安定下来。接着，又分别召开了民校教职员、私立中等学校教职员、市立小学教职员、私立小学教职员和社教机关人员等座谈会，分别宣布接管政策。

五月二十六日，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市教育协会分别召开公、私立中学校长会议，同时又在报上发出通知，要求各校严守秩序，继续上课。上海市所有学校，经历了解放上海这样一个大的革命历史事件，却没有停止一天课，这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办得到。

市立中学校长，大多为国民党党团分子所把持，早已潜逃离沪。我们除了新派地下教委配备的部分校长外，又选派学历较高、富有办学经验或有一定名望的人士担任校长，如上海中学孙福熙，育才中学史存直，高桥中学程应璆，洋泾中学李象伟，陆行中学李之朴和市一女中钟复光等。党员派为校长的，大多是任教多年的老校长，如敬业中学陈云涛，上海中学陈光祖（副校长），市东中学（缉黎）段力佩，务本女中左淑东，江湾中学叶克平，虹口中学（原师专附中）戴介民，吴淞中学王一知，市北中学辛德培，真如中学王亚文，格致中学陈尔寿，晋元中学姚湘涛等。凡不属国民党党团分子或反动政客，而是热心办教育的原校长，都予留任。如市西中学校长赵传家，杨思中学张乃璇。另有复兴中学，调派原上海中学有经验的老教师张信鸿担任校长；市立师范（新陆师范和女师合并），商请刘佛年教授兼任校长；七宝农校，请从事农业教育多年的薛圭方担任校长；高行农校原校长周增英留任。

至六月底止，全市市立中等以上学校、市属社教机关和各区的中心小学，全部由市政教育处派军代表一一接管，市立小学则由区的接管系统分别接管。

二 整顿和改造私立学校

市立学校数量少，接管比较顺利。私立学校不仅数量大，情况比较复杂，性质也与市立学校不同，所以不采取直接接管的办法。一九五四年以前，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加强管理和重点整顿上。一九五四年后，进一步研究全面整顿，加强党的建设，消灭空白点（有相当数量的私校没有党的领导力量），并制订逐步接办为公立的计划。故对私校的整顿改造，时间拉得较长，直到

一九五六年全部私校改为公立时才算完成。现谈谈对不同类型的私校采取的不同处理办法，并重点回忆对外资津贴学校改造的大致情况。主要是讲中学，至于小学，其基本精神与中学是一致的。

首先，加强对私校的管理，要求私校坚决执行人民政府的一切法令、指示，不得违抗。所有私校必须办理登记，非经批准不得开办新校。学校是社会事业，私校校产是社会财产，校董会、校长不得私自变卖或转移。学校停办必须经政府批准。学校经济必须公开，合理支配。要向工农开门，招收劳动人民子女入学。采用政府规定的教材，对反民主主义的课程，如公民课、童子军、宗教课等，坚决取消、取缔。学校实行民主管理，不得压制师生爱国的、进步的政治活动。学校每届招生，均需报经市政教育处(后来的教育局)批准。关于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政策，与市校同。政府对私校，在教学业务的领导方面，与市立学校同样看待。

其次，针对复杂情况，对不同类型的私校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除极端反动的如中正中学、青白中学(三青团直接控制的)和达人中学(原警察局宣铁吾系统的)立即宣布停办外，又分别采取以下几种处理办法：

第一种类型是地下党员办的，党直接领导的。当时只有长宁区的省吾中学继续办下去，其他如储能中学、华东模范中学和复夏中学，由于办学人和教师大多另有任务调离，学生亦大多参加军队随军解放西南去了，因此停办。直至1983年暑假，华东模范中学和储能中学才先后复校，复校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

第二种类型是与反动党、团、军、特关系密切，并为他们所控制的。对这类学校，我们直接派员整理，叫“整理私校”，但私校

性质不变。在工作关系上，同市立学校一样看待，如在召开市立学校会议时，请整理私校的校长、教导主任参加。以民立女中为例，创办于一九〇六年，原是王苏、汤苏二姊妹为争取妇女独立而办的，在抗战时期被国民党 O. C 系分子社会局局长童行白强行夺去，作为他的反动政治资本。该校规模大，有总校、分校，学生共一千多人，教职员一百多人。校内设有国民党区分部，还有三青团组织。我们就请吴若安同志去进行整理，担任该校校长，另配备党员担任教导主任。

第三种类型，多为民族资产阶级和热心教育人士所办，有的是会馆、同乡会所办等等。这些学校有一定的进步力量，有的在解放前是“民主堡垒”。对这类学校，我们责成他们加强办学，努力改造，如南模、南洋、南洋女中（现向东中学）、比乐、澄衷（现五十八中学）、麦伦（现继光中学）、位育（现五十一中学）、民立（现六十一中学）、糖业、钱业、爱国等校。

第四种类型，大量为学店，规模一般较小。对这类学校，要求他们继续办下去，如师资、领导力量较弱，同意他们自己调整、合并。这类学校比较突出的问题，一为缺少民主办学思想，二为经济不公开，一般教师待遇低，因此师生意见较多。我们要求他们民主办学，经济公开，不清算过去，有纠纷时协助调解。

私校情况复杂，这里举一件国民党特务组织 D. R. P. 的事件为例。这个特务组织是上海解放时潜伏下来的，它选择了两个学校作为反革命活动据点，一所是私立育材中学（常熟路），另一所是私立广澄高级药学职业学校（新闸路）。特务头子狄宪章潜伏在育材中学充教师，在学生中发展特务组织。广澄药校是新亚药厂为培养药剂人员附设的，学校规模不大，学生人数不多，校长是挂名的，教职员大多是新亚药厂职工兼职，学校中没有进步力量，没有专职人员，课后无人管理。反动骨干“行动科

长”王章禄就在这所学校潜伏下来，进行 D. R. P. 的大量反革命活动。反革命传单是该校油印机印的；训练反革命爆破技术，是在该校的教室内进行的，烈性剧毒药氯化钾是藏在该校药品橱内的。幸而被我发现破案，未能造成破坏事件。以上事例，可以说明私校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不用说把这些学校改造成社会主义的新学校了。

第五种类型为外资津贴学校（俗称教会学校）。这类学校的问题较多，特别是其中的一部分天主教学校，问题尤为严重。他们控制很严，压制、打击进步教师活动，甚至因此解聘教职员，尽管我们公开宣布教会与学校分开，在校内不准搞宗教活动，但暗底里他们仍然做弥撒，咒骂共产党。基督教系统的学校，主要是宣扬媚美崇外思想。所以，外资津贴学校是整顿私校中的一个重点。对少数极为顽固反动的，如徐汇中学和震旦附中，我们就支持进步师生展开斗争。据回忆，谈几个事例。

最早发生的是进德、求德两校事件。进德女中阻挠学生爱国活动，不准学生参加庆祝开国大典，继续开设宗教课。学生会向《解放日报》揭露，得到各方支持，在校内开展斗争，校方被迫登报检查，我们给校长记过处分，停止宗教活动。求德女初中也发生类似事件，我们派人去查，校长（嬷嬷）自动辞职。这两个事件的处理，推动了外资津贴学校师生的爱国运动，有的迫使宗教势力退出了学校。

斗争最激烈的是徐汇中学和震旦附中，特别是徐汇中学。早在一九四八年，罗马教廷就派人来组织“应变”力量。徐汇中学有一种“分院制”，分上院与下院，它把教徒与非教徒分开，住读生与走读生分开，高年级与低年级分开，不许往来，如果见面讲话，就要罚跪。解放后，该校仍继续实行分院制，企图继续实行宗教统治，封锁内情，防止泄露。校长张伯达搞了不少阴谋，如